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张继焦^{1,2}, 侯晓晨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调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共同构成了理解人文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在理论层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在对西方人文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其理论内涵可以从唯物史观下文化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在历史层面,该论断的提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之必然,承继中国人文经济思想传统的根脉之所系,更是不断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大势之所趋。在实践层面,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实践有“四种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同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注意应对和解决“两种困境”。深入分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三重逻辑,准确理解和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92.7;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4)05-0080-08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4.05.009

一、引言

早在2006年,习近平同志就曾提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和发展。”^[1]其中的“文化经济”思想成为对文化和经济间关系的经典概括。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人

文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关于阐释文化和经济间关系的理论,遵循着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为新时代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是对当前世界文明发展面临的方向、动力等结构性困境的理论突破和实践指向。

在我国,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融合始终是关乎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下,学术界围绕“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论断掀起研究热潮,各地纷纷展开以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为主线的探索实践。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着手,在理论层面梳理人文经济学范式更迭的学

收稿日期:2024-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20VMZ00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和重点创新工程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改革与完善研究”(2022MZSCX00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主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侯晓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理逻辑、基于时代背景理解这一重大论断形成的历史必然、回归社会现实考察基于该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有助于全方位、多维度地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本质要求、具体内涵和发展方向,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导向。在此基础上,推动我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权的构建,也是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应有之义。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建立在对西方社会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学范式反思的基础上,是由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实践引发的理论探索,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统一性的重要体现。对此,可以从唯物史观下文化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来理解。梳理和明确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基本内涵和学理脉络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基础。

(一) 理论反思:经济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人文经济思想的“原始发生”孕育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道德母体,其在诞生之初曾属于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彼时古希腊、古罗马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特征给予关注,成为人文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正义的强调触及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议题,《国富论》的出版成为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早期的人文经济思想延续了对人的理论关怀这一研究传统,对经济行为中人性、道德和伦理等要素进行了深刻洞察,并以此作为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道德基准。19世纪下半叶,随着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以抽象理论和精密分析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经济学日益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此后经济学逐渐脱离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演进,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

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经济学研究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工具,对人的选择行为进行计算和预测。其理论局限性在于强调“资本的人格化”,排除“人文向度”,忽略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本质,从而引致经济学的贫困化现象。事实上,人作为

行为主体,其选择行为涉及三重身份:“经济人”“社会人”和“文化人”,分别对应着物质利益最大化、社会关系的维系和精神需求的持续满足。有学者意识到单一“经济人”假设并不能充分解释人类特质的丰富性,开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进行反思,尝试找回缺失的人文价值。“精神生产力”“边际效用”等概念的提出顺应了这一趋势。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围绕作为精神驱动力的教义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促进作用展开相关讨论,被认为是广义文化经济学的开端。〔4〕1988年,继美国学者首次使用“人文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概念之后,人文经济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5〕(PP. 80-81)经济领域的“人文复归”为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举旗定向,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研究旨趣也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发生了重要转向,文化要素被纳入变量范畴用以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经济学研究不仅关注经济行为产生的“物”,还关注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不仅致力于解决经济活动的“实然”问题,同时也对“应然”问题有所回应。

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经济学研究基于“理性人”假设,以“资本—财富—经济”三维度建构作为理解现代世界的基本框架〔6〕,其人文精神实则是资本主义内在运行机制的抽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理论呈现。反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其理论创新突出表现为对西方话语体系下经济学“人文缺失”引致的“人文危机”的反思和超越,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7〕故从理论逻辑来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西方人文经济学存在本质差别。

(二) 理论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和文化表达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二者在基本内涵和主

要观点等方面具有高度同一性,必须在长期坚持中不断发展完善。这也决定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不是以抽象人本主义逻辑为前提的当代西方人文经济学,也不是认同资本的“普遍有用性体系”的西方文化产业经济学[8](P.15),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思想为起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与中国本土人文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和文化表达。

具体而言,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9],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其体现的大文化观,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也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出发,坚持运用这一思想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同时,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既要认识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也要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本观点对于促进社会协调运转和经济良性发展的方法论意义,进一步深化对文化与经济间关系的认识,加快建构中国自主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赋予人文经济学鲜明的中国印记和中国特色,以伟大理论指导伟大实践,不断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三)理论内涵:唯物史观下文化和经济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10](P.10),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文化和经济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与内涵,有助于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一创新论断的若干重大问题,防止陷入“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认知误区,避免走上经济或文化“单向度”发展的错误道路。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蕴含着文化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辩证法思想。唯物史观下,文化和经济之

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着文化的内容、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另一方面,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又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反过来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积极的,也有可能带来负向能量和风险。因此不能一味强调文化的指引作用,而忽视文化对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潜在隐患,以及经济对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此外,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有时并不完全同步,因此应将那些文化发达、经济同样领先地区的人文经济实践作为典型案例,从中汲取经验,但也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较好而文化相对落后或身处文化高地而经济欠发达等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不对等的情况。文化与经济紧密结合、相互渗透,二者融合互动才能催生“人文经济”,最终形成以文化建设为内核的经济形态和以经济发展为依托的文化表达,即“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在此基础上,文化和经济不仅可以分别发力,通过文化经济化拓展文化的发展空间,以经济文化化厚植经济发展的人文内涵,还可以通过双向互动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人文经济学在我国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逻辑和客观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正如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之延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在社会“传统—现代”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中考察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是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文化基因和精神实质的重要方式和独特视角。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之必然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是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当代表达,也不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济学思想的简单重复[8](P.15),而是“两个结合”的直接产物。“两个结合”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决定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指导实践,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和价值体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1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至高的价值追求[12],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学,是真正的“人民经济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表达,其核心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主张相契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立场的生动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13]历史表明,推动人文经济思想与时俱进、加快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续写人文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的重要途径,更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承继中国人文经济思想传统的根脉之所系

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魂脉”,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是“根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厚植于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道德伦理观、义利观、民本思想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人

文经济思想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思想土壤。可以说,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承继中国人文经济思想传统的根脉之所系。

儒家、道家和墨家学派的思想之争是先秦思想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礼与食孰重”“身与货孰多”构成了其争论的焦点,即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谁更重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与物质财富相比何者占据更高位。[14](PP.41-42)人文经济归根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以民为本是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突出特征。民本思想肇始于商周时期,“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奠定了我国延续千年的人文主义传统。[5](P.83)从“君权神授”神本主义天命观到“敬德保民”民本主义天人观念的转向,都深刻影响了我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内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皆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等“富民”“惠民”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也在于以经济服务人民。“义利观”是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重要范畴,如儒家学派强调义利之分,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义以为上”作为精神追求[15];墨家学派主张义利统一,认为“义,利也”。义利之辩成为古代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指引,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于此。

上述讨论成为今日人文与经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议题的逻辑起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也大都从中找到源头。人文和经济的关系在矛盾共生中不断流变,其影响贯穿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几乎全部的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化的功能日益丰富,文化的主体性甚至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进入新时代以来,传统人文经济思想中的各类观点不断交融汇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呼之欲出。

(三)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大势之所趋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仅根植于厚重的中华文化,还遵循着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

阶段,在长期奋斗过程中凝聚而成的智慧结晶。人文和经济的关系,是人文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本质上反映的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一对关系,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 20 多年以来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重要理念,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战略方针。[16]我党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长期发展的世界奇迹,还注重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精神世界的发展创造条件,旨在从根本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一面经济繁荣,一面文化鼎盛,文化与经济超越了“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由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式发展实践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部分现象是既有理论无法做出充分解释的。为此,我党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对新时代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就包括人文经济学。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新一轮产业变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观点符合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迎合了新时代民众呼声、回应了时代要求,意味着“以物为本”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开启以人文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的新阶段。当下,文化和经济的互动融合与推进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文化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论断的提出很好地回应了现实需要,对于指引铸就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逻辑

发展当讲身体力行、久久为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是主观臆想之物,而是秉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一基本原则,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不断积累沉淀的结果。从我国人文经济学实践先行地的典型案例来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学,不仅具有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还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入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逻辑,是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理论创新,使理论和实践更好结合的源头活水和必由之路。

(一)人文经济学实践的“四种类型”及主要特征

人文经济实践是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互动中进行的。经济和文化分别构成了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逻辑的两个重要方面,如果将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作为衡量人文经济实践的两个关键变量,根据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相对水平和相互关系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实践类型:人文经济协调发展型、经济先行文化滞后型、文化先行经济滞后型和人文经济双重困境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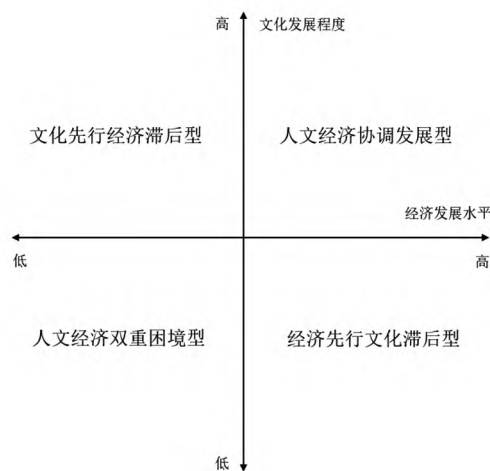


图 1 人文经济实践的四种类型

经济和文化同步发展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经济和文化都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二者的互动呈现出协同发展的理想状态,即为“人文经济协调发展型”。其发生地多为我国人文经济实践先行地,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且文化资源得到了有

效的开发和利用,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同时进行,并在阶段性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经验,如杭州、苏州和潍坊等地正在进行的人文经济实践。相反地,如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则属于“人文经济双重困境型”,说明该地区处于整体性滞后状态,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短板,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较为疏离,或呈现出某种负向的互动关系,不利于维持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如我国衰退型“资源型城市”^①煤城鹤岗、锡都个旧等地都面临着人口流失、产业衰退、城市发展空间收缩的困境。

在人文经济实践中,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时会出现错位、不匹配的情况。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则属于“经济先行文化滞后型”。如我国部分“资源型城市”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更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导致经济结构单一,人文底蕴缺失。鄂尔多斯因煤而兴,其GDP总量、人均GDP在各盟市^②乃至全国均居于领先地位,但就2020年统计数据来看,当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19%)位列末尾,远低于同期全区平均水平(2.18%)和全国平均水平(4.43%)^[17],可见当时其文化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与之相对,“文化先行经济滞后型”则表现为与文化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支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不足。如影视作品《狼图腾》的上映带火了乌拉盖草原文化,引发了中外影迷的向往,但在当时,地方尚未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以承接突然壮大的客源市场,交通网、精品旅游线路等设施以及草场综合整治改良工程是在后期才逐渐进行的,文化发展程度与地区整体经济建设水平不符。

当然,上述分类只是对人文经济实践类型的初步划分,不同地区人文经济实践所呈现的特征可能是阶段性的,随实践的深入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故判断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要基于历史视角,进行综合判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人文经济学实践的“三个方面”及典型例证

在上述四种人文经济实践类型中,“人文经济协调发展型”实践具有文化与经济高质量协同

发展的特征,属于人文经济实践发展的理想状态,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具有可观察、可推广的特点。总体来看,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实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继承和弘扬传统商业文化。一方面,重商文化传统下商业的繁荣为当代人文经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准备;另一方面,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弘扬也构成了人文经济发展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来源。如杭州素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之称,有着悠久的重商主义思想传统,其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文人创业,杭商大多贾而好儒、亦贾亦儒^[18],不仅具有浙商精神的一般特性,还形成了独特的杭商文化,人文积淀浓厚。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始终坚持继承和弘扬传统商业文化,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作为宝贵财富,形成了“开放包容”“求才心切”的社会氛围,成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实践得以进行的基础和起点。

第二,持续推动文化经济化。通过开发利用以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实现从文化到产业的跃升,为经济发展注入人文底色和文化生命力,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的重要步骤。苏州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最早的区域之一。^[19]作为我国手工艺生产的重要基地,苏州创造的产业革命道路既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美国学者德·弗雷斯(Jan De Vries)所说的东方“勤劳革命”,而是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苏作革命”。其发展正是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加之精湛的手工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如刺绣、玉雕、核雕等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均是典型例证。^[20]

第三,大力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善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文化真正赋能经济,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的关

①根据国务院2013年公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资源型城市”是以依托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特殊类型区域(包括地级市、地区等地级行政区和县级市、县等县级行政区)。规划范围包括262个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类。

②内蒙古自治区有12个盟市,其中地级市9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盟3个: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兴安盟。

键环节。以潍坊为例,当地坚持以文兴业,积极构建文旅融合发展的空间载体,扎实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借文物见人、见史、见文脉,不断激活文化生命力。据统计,潍坊现已建成80余家博物馆,其下辖市青州市是古九州之一,青州博物馆新馆耗资10亿元、占地10万平方米,于2023年5月正式开馆,吸引了大量游客,已经成为传播地方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2023年潍坊地区生产总值达7606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梯队,上演了一堂生动的人文经济实践课。[21]

(三)人文经济学实践的“两种困境”及应对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同步或者不协调导致的单向度的发展是一种低质量的发展,就其本质来讲属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经济文化处于双重困境的地区则需要针对“经济滞后”和“文化滞后”分别破题,人文和经济“两手抓”,从根本上摆脱发展滞后的困境,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实现整体性跃升。

第一种困境是“文化滞后”,即经济发展先行,文化建设相对迟缓,此类地区通常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自然资源依赖或枯竭,文化资源稀缺、闲置或浪费的情况。其困境表现为经济发展缺少人文底蕴、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文化产业是人文经济发展的重要事项,但人文经济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化产业,二者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解人文经济,文化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当前,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整体发展相对缓慢,原因在于产业经济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没有高质量的产业经济,就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发展也无从谈起。故第二种困境是“经济滞后”,即文化发展先行,但经济发展相对迟缓。通常表现为地方经济基础薄弱,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其困境在于,存在文化发展缺少物质支持、发展基础缺失和稳定性不足等问题。

针对上述两种人文经济实践困境,破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将文化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标。一方面,从文化端发力,加强文化建设,摆脱资源依赖,为经济发展厚植人文底色,实现转型发展;另一方面,推动文化经济化进程,以文促旅,文旅融合,让文化真正赋

能于经济,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最终作用于地方经济建设。具体而言,在物质文化层面,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推动校企联合、产学研结合[22],提升经济发展的人文底蕴;在精神文化层面,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驱动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尤其是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应注重精神文化遗产和工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以非资源性产业为产业转型的重点方向。[23]目前我国很多成熟型、成长型“资源型城市”依托地方特色文化建立博物馆,发展人文历史旅游和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走上了高质量的转型发展之路。如山西晋城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河南省平顶山市尧山—中原大佛景区等;还有打造以资源型城市发展历史和先进人物事迹为主线的博物馆、纪念馆等精神文化设施,如大同煤矿遇难矿工万人坑展览馆、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等,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五、结语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这一论断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因,具有历史发展之必然,并在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该论断以其独特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自成一体,形成了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人文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和文化表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激活了我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想象,描摹出经济财富和精神文明互动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其巩固和完善对于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任重道远。要写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需要基于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24],既要在人文经济实践中不断探索、汲取经验,也要加快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使传统与现代同频

共振、文化与经济交融共生、理论和实践更好结合。

一方面,应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以实现物质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25],发挥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使文化赋能于经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共同进步,最大程度地弥合地方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落差,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

另一方面,在理解和归纳政策话语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多元学科力量,形成学科发展共识,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相结合,以人文与经济交叉的人文经济学作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学科支撑,用先进理念指导伟大实践,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吸纳有益研究成果,构建既能反映人文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超越西方人文经济范式的局限,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开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进而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精神、形塑中国价值、贡献中国力量,为国际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 [1] 哲欣:《“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浙江日报》,2006年10月30日第1版。
- [2] 应雪林:《不断实现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0日第13版。
- [3] 邹智贤:《人文经济学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
- [4] 向勇:《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态》,《人文天下》,2023年第10期。
- [5] 王忠、车学森:《人文经济学研究: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 [6] 周露平:《人文经济学的思想叙事与中国践行》,《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 [7] 任平:《深化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4期。
- [8] 桑明旭:《以唯物史观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 [9] 顾海良、张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4期。
- [10]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知》,2021年第4期。
- [11] 刘儒、王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研究》,《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3期。
- [12] 魏建:《人文经济学为经济研究开拓新领域》,《光明日报》,2024年7月9日第11版。
- [13] 《人民日报》评论部:《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人民观点)——“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人民日报》2023年7月17日第5版。
- [14] 王晓静、刘士林、杨珺涵:《人文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 [15] 李翔海:《儒家义利观:义以为上》,《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3日第16版。
- [16] 金振娅:《凝聚起精神的力量——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综述》,《光明日报》,2020年5月31日第1版。
- [17] 潘萌:《把握大势 直面问题 精准发力 多措并举 全力提升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鄂尔多斯市统计局》,2022年6月7日。
- [18] 张俊华:《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7期。
- [19] 陈忠:《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 [20] 庄建伟、相乘军:《传承优秀文化复兴传统产业——苏州历史文化名城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城市规划》,2014年第5期。
- [21] 孙磊、韩国鹏、尹明波:《“更好潍坊”:人文经济学的生动实践》,《中国经济导报》,2024年7月4日第1版。
- [22] 胡璇、孙莺桐:《吉林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问题研究》,《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4年第2期。
- [23] 赵秋运、蒋美、朱欢:《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 [24] 仲音:《写好“人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人民日报》,2024年6月4日第1版。
- [25] 张帆、刘莉莉、张雯婧:《以文化人 以文惠民 以文润城 以文兴业 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图)》,《天津日报》,2024年2月8日第3版。

(下转第100页)

City Sample of Humani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angzhou

LUO Weidong¹, LAN Weiq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a general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cope of humanistic economy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definition, humanistic economy is not simply a cultural economy, but a new form of economic civilization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ness and putting all people at the center,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universal happiness, excellent culture as the connotation, moral emotions as the benchmark, and aesthetic needs as the guide, to achieve a socialist economy that harmonizes humans and n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consci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angzhou, as a sample city of humanistic economy in China,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measure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Hangzhou's sample city of humanistic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er level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y.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Hangzhou sample; urban governan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李春燕)

(上接第 87 页)

The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Jijiao^{1,2}, HOU Xiaochen¹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is a new paradig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at adheres to the value concep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y.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umanistic economic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is formed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on and surpassing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Western humanistic economics.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under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t the historical level, the proposition of this conclusion i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root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umanistic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trend of constantly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humanistic economic practices in the new era,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ree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roc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ddressing and solving two dilemmas. Thoroughly analyzing the triple logic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and firmly grasping the new ideas, viewpoints, and judgment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world valu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putting people firs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蒋金坤)